

从“国文”到“国语”:官民互济视域下“五四” 语文教科书的出版传播研究^{〔*〕}

褚金勇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语文教科书的改革、应用与推广在中国近代白话文的确立普及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考察白话运动中官民互济问题的重要观测点。五四时期,在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语体变革过程中,民间知识精英积极借力政策、市场等多元因素,知识精英的倡议动员和研讨论证、政府官员的政策颁布与标准制定、出版商的组织编撰和出版发行都是国语教科书出版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三方的协同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语文教科书的白话转型。

〔关键词〕教科书;国文;国语;官民互济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6.017

从文言到白话的读写变革是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密切相关的命题,在白话文确立的过程中,语文教科书的改革、应用与推广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在五四时期的教育教材讨论中,后来为人们熟知的“以白话代文言”多以“以国语代国文”之名进行,两种说法观测角度、思维路径不同,但也有很多的交叉融合,正如蔡元培所言,“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1〕}蔡氏作此发言时是1919年11月,正是文言与白话、国文与国语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之际,此时从“国文”到“国语”教科书改革经过多年的民间倡议、组织讨论,即将从一纸民间提

案升格为全国推广的官方政策。此中,教科书是政府权力意志、教育知识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相关联的领域,国语教科书的倡议、出版与传播正是白话文运动中官方与民间的交叉点,也是考察白话运动中官民互济问题的重要观测点。既有的相关研究分别从晚清政府的官方资源、南北议和的政治形势等方面探讨白话文运动的官民互济问题,^{〔2〕}本文则是从官民互济视角考察五四时期语文教科书的语体变革问题,借助“国文”“国语”讨论的历史资料和思维路径,挖掘知识精英、政府官员和出版商各方的力量竞合与逻辑思考,有利于拓展文白之争、官民互济的研究视野,呈

作者简介:褚金勇,传播学博士,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间与官方互济视野下近代白话书写研究”(17AZS002)的阶段性成果。

现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变革中多元力量交相混杂又协同共进的实际流程。

一、从“国文”到“国语”：教科书变革的 倡议、讨论与出版

晚清以降,科学以分科之学的逻辑力量推动了中国传统经学一元知识体系的瓦解,各种学科纷纷独立,此中语文学科也逐渐独立出来,且成为一众学科关注的焦点学科。当然,当下为人熟知的“语文”学科曾经历过“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国文”“国语”等名称的历时变化,后来才被定名为“语文”。即使本文讨论的“国文”“国语”也并非自古有之的旧典制,而是中西文化碰撞中出现的新名词。正如黎锦熙所言,“本国文字谓之国文,本国语言谓之国语,都是近年发生的新名词。”^[3]这一部分将从学科教材角度考察五四时期“国文”“国语”的消长沉浮。

(一)以“国文”立科:语文学科的古今转换

1919年之前,“国文”是语文学科的官方名称,以“国文”命名的教科书俯拾皆是。但需要看到,“国文”这一学科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官方认可,而是逐渐代替了“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的名称,并接管了“读经讲经”的地位,最后成为官方课程名称。早期民间的国文教科书有载:“国文者,以文字代一国之语言也,人有思想,必藉语言以达之,语言过而不留,必藉文字以传之,故国文之用最大,离他学科而独立,良有以也。”^[4]国文是以文字读写为基础和主要授课内容的学科,文字读写能力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身份象征,也是自古以来儿童启蒙教育的入门课程。《汉书·艺文志》有言:“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5]儿童读写能力的培养,必然无法离开教本、教材。据学者考察,周秦以降至两汉,华夏大地上陆续出现了多种识字教本,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训纂篇》《急就篇》等,至隋唐宋元明清,除《四书》《五经》之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逐渐成为民间推崇、官方认可的读

写教本。^[6]当然,这些教本、教材并非有着界限分明之学科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传统的文字读写教育,没有近代意义的“国文”一科,传统的语文教本读写之学与经史之学混杂交融,可谓涵盖识字、求知、行事、修身、养德等多元知识的综合性教学材料。

晚清之季,中国遭遇东西洋坚船利炮的攻击和制度文化的冲击,逐渐失却文化自信。当时在朝在野的知识精英都希望借助学习西方的知识教育制度以自强,不但学习西方的学科学制,而且开始效仿西方编制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于次年开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和中学开设“中国文学”,跟“外语”“算术”等科并设,被学界视为语文独立设科的象征。该《章程》指出设立“中国文字”目的在于“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7]设立“中国文学”目的在于“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8]当时的语文教育所授之“文”并非日常使用的语词,而是用于学圣成贤、科举取士的文字文章。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领域进行了系统性改革。经由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民国教育部通过了“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的提案,并颁布了史称“壬子学制”的新学制,在课程设置上取消了忠君尊孔、读经讲经的科目内容,废止了“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科,改设“国文”科。^[9]值此之际,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争相推出《中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以因应政权鼎革与学制改革。自此,知识精英编选、出版社出版和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成为知识权威的源头,广大学龄儿童和知识群体不再唯圣人垂训是瞻。但受古代教育传统的影响,认为“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也”,^[10]于是教科书语言依然保持古典雅驯的原则。^[11]“君子执言,皆雅言也。”在中国古代人文教育

中,文人的品行修养与文章书写有着交光互影之关系,此一雅言书写的形式与古代礼仪相互协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12]承传雅言传统的“国文”学科,不但承担着读写能力培养,也承担着敦诗说礼、人文化成的功能。正所谓:“国文者,国民精神之产物,所以表出国民特性以示他人,不特为思想交通之器械,而亦陶冶国民品行,所不可缺者也。”^[13]

(二)以“国语”相召:语文教科书的文白变革

在“国文”大行其道之时,“国语”尚在孵化孕育之中,以“国语”命名的教本只是偶尔在民间自编的教学材料中出现。照常理而言,“国文”“国语”应该是一国语言的一体两面,国文是国语的书面形态,国语是国文的口头形态。但在古代中国,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难免出现差异甚至人为制造差异,不但造成了语言的区隔和等级,也导致书写知识的垄断与社会民众的愚蒙。针对民初雅训的国文教科书,梁启超毫无避讳地指出:“从前一般教育家,深以儿童读经为诟病,诚以六七岁之儿童万不能与之讲经说古也;今虽易以教科书,而所用者犹是古来文字,直五十步笑百步耳,科学之不能进步者以此。”^[14]许多仁人志士看到雅训的国文教科书依然无法成为撬动国民启蒙、科学进步的语言杠杆,不由得心急如焚、揭竿而起。胡适、陈独秀以《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两篇檄文拉开了改文言为白话的文学革命序幕。在同人的影响下,刘半农对学校国文教育痛加批斥:“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15]钱玄同则向青年学生发出“告别国文”的号召:“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

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16]在一众师辈战斗檄文的鼓励之下,一位中学生也致信《新青年》编辑,痛诉学习国文的苦难史:“每读一文,老师必讲此文之起承转合,于‘若夫’‘然则’诸字,不惮反复解说,往往上课一句钟,即专讲此类虚字;但我等听了许久,还是莫名其妙。前年秋,来了一位讲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专选苏东坡、归有光诸人之文,而于每文之后加上一千字左右之评语;讲解之时,于本文文句不甚注意,即取此评语细细讲说,他老人家越讲得津津有味,我们越是不懂。所以同学诸人最厌恶的功课,就是国文,不特仆一人存此想也。”^[17]

在国文教科书中,文言与白话的并行路径依然将一国之众割裂为“士大夫”与“小百姓”两大阶层,不但无法实现民国所许诺的“民主共和”,而且无法打破语言鸿沟以形成维系国族想象共同体的全国通用语言。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语体变革,致力于以浅白化的国语推行教育。“国语”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物,其包含的官话、国音、拼音字母等知识看似只是知识学习的工具,但攸关国族认同,诸多仁人志士以“国语”相召,其志在以语言统一凝聚民族认同以形成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1916年陈懋治发表《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提出“改初小国文科为国语科”。1917年1月,梁启超在教育部讲话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鄙人以为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诚目前非常重要之事。”^[18]1917年3月《新青年》发表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宣称“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而针对读者黄觉僧提出的教科书改革问题,胡适也提出了改国文教科书为国语教科书的建议:“现在的一切教科书,自国民学校到大学,都该用国语编成”,“国民学校全习国语,不用‘古文’”。^[19]教科书改革讨论如火如荼,但现实语言秩序森然,胡适等也承认要确立国语的合法权威地位,尚有很远的路要走:“虽然有小学语文

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论,但古文学的权威未倒,白话文学的权威未得到一般文人的承认。”^[20]

考察1912到1919年间语文教科书使用情况,整体仍以国文教科书为主,但民间已经出现了自发编印的国语教科书,并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大约在1915年,俞子夷就在江苏苏州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私自实行了用白话文自编教材”,^[21]当然文言丛林中使用白话教学不由得生出“吾道太孤”的感慨:“本校毅然决然用白话文教学生,常有一种‘后不见来者’的恐慌。在苏州地方,苏音离官音太远,人家更不敢试用,即有试用的,也是枝枝节节,不是完全根本改革,所以常怀有一种‘吾道太孤’的鬼胎。”^[22]另外比较典型的是北平孔德学校的教学改革。1918年,孔德学校对国文课进行改革,由钱玄同等几人“编了一本《国语读本》”,“教授国文,注重白话文,且用注音字母来画一语音”。^[23]除了自编自印自用的国语教科书,大的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春季始业本)》也尝试加入白话文以改良教育语言体系。但是考虑到当时仍是文言占据权威地位的社会背景,编者反复斟酌后决定以文言编写“正课”,而以白话文编写4篇“附课”。当然,中华书局这种容纳白话的国文教科书有创意但不彻底,而且此种做法尚属于出版商和编选者的民间自发行为,并未获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许可。

二、从政策到市场:教科书出版中的文人、政府与出版商

从晚清到“五四”,从文言到白话的教科书语体改革一直在讨论试验之中,但一直不温不火。直到1920年,国语教科书忽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白话文运动也势如破竹。唐德刚讲述这段历史时过于强调胡适等民间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白话文运动成为“举国和之的运动”,“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不能不归功于胡适”,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24]以胡适为

代表的民间知识群体在中国近代白话文确立普及上,的确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但倘若将一切功劳算在他们身上也难以让人信服。教科书语体改革是由民间知识精英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提出来的,但国语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也受到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

(一)借力政策:北洋政府的学制改革与语言规划

尽管从晚清的裘廷良、陈荣衮到民初的胡适、蔡元培,民间知识精英一直在呼吁教科书语体从文言改为白话、从国文改为国语,但早期零星出版的国语教科书尚属于民间自发出版性质,未能获得政府教育部门的承认或许可,也不可能产生太大影响。正如阿普尔在《教科书政治学》中指出的,“政府部门在教科书的产生、选择以及合法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5]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不同于普通文本,它是知识生产、传播的特殊载体,也是学校开展人文教育的专门工具,承担着传播正统语言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能。所以政府教育部门往往设有“章程”“规则”“标准”一类的官方文件予以规范和限定。胡适等民间知识分子也深知教科书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它承担着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在没有获得官方允可,没有官方政策文件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在教科书改革中虽然可以大力提倡、热情讨论但又时时表现出“倡导有功,实行无力”的窘境。例如,1918年5月,盛兆熊致信胡适讨论文学改革进行的程序,盛氏指出:“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倘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或者先从理工两科改起,文科暂缓),那么,中等学校里自然要注重白话文字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那岂不是如‘顺风行舟’,很便利的法子么!”胡适在答信中一方面承认“来信论文学改革实行的程序极中肯要”,同意从教育制度层面推进白话文学的思路,但另一方面又说“这话虽有道理,却也有许多困难”。困难在何处呢?“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

话”。在倡言没有得到官方承认普及实行之前，民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26]

当然，胡适、蔡元培等在民间讨论的时候也从未停止向政府部门建言。谈起白话文运动，我们津津乐道的是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却往往忽视蔡元培同年3月上呈教育部的提案：“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言入文始。”^[27]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与蔡元培、黎锦熙倡导的国语运动密切合作、并驾齐驱，积极参加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各项组织活动，同时在语言革命、教材改革方面不断向政府提供各种政策建议，与主管教育教材领域的官员保持密切沟通。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刘复在1919年提交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是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方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一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28]根据黎锦熙的记载，此时教育部几个重要部门都由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掌控，如普通教育司司长张继煦，主管师范教育的第一科科长张邦华，主管小学教育的第三科科长钱家治，还有参事室的汤忠、蒋维乔、邓萃英和秘书处的陈任中（修改法令要经过参事室和秘书处），都是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这些政府官员在“从国文到国语”的教材改革从民间提案转化为官方政令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提案，张继煦、张邦华等教育部官员的暗中推动，使得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改革建议进入了北洋政府最高层的

视野之内，此时正值国民党领导的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南北议和的博弈相持阶段，北洋政府的首脑徐世昌、段祺瑞也有借力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统一运动进行“由北统南”的语言政治考量，^[29]由是多种因素在此汇集，促成由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名义下发的教育部“国民学校令”：“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国文’均改为‘国语’。”^[30]这则“国民学校令”要求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将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随后，教育部还强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并发布详细的政策解读：“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之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31]这么一纸政令，就将教文言的“国文”改成了教白话的“国语”，使雄踞中国少年儿童教育数千年的文言文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连胡适都感慨万千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32]“假如只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33]但同时民间知识精英也认识到单靠政府力量也是不行的，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34]

(二)借力市场:出版社的学商连接与教材编撰

除了借力政府政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商业资本的介入在教科书语体变革中的功用也不可小觑。胡适曾以“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的“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35]来评价商务印书馆,正是深谙出版商对教科书的编撰出版的把控直接辐射影响到一个地域甚至整个国家少年儿童的知识教育和思想启蒙。尽管政府权力在语文教科书编撰的顶层设计和标准制定的宏观层面有着决定性的把控力量,但具体到教科书编者的聘选、作品的遴选、框架的搭建、出版的册数、发行的范围等中微观层面,出版社的力量则凸显出来。出版商也往往以扶助教育、培养人才为己任,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强调自己的出版宗旨“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36]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也曾自嘲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37]当然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商而言,他们的出版行为除了自我宣扬的人文情怀外,主要遵循资本逐利的原则。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商务印书馆正是借助出版教科书赚取第一桶金才从一个小型印刷所陡然成为有影响力的著名出版社,而1912年1月1日创办于上海的中华书局正是瞄准清朝灭亡、民国肇造的政权鼎革机会,提前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抢在商务印书馆之前推出新编《中华教科书》才占据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并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38]理念宣扬与出版实践相结合才使得中华书局能在出版竞逐激烈的上海立稳脚跟,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并峙的出版双雄。张元济、陆费逵等出版商一方面广交知识精英以寻觅编辑人才组建自己的思想智库,一方面秘密结交政府官员随时关注政策动向,因此

他们对于政府政策有着敏锐的嗅觉,而且能够在获取政策信息后迅速组织编辑人才以最快速度编写教材推向出版市场。

在以“国语”代“国文”的教科书语体变革政策出台之际,曾经在政权鼎革时输掉大部分教科书出版市场的商务印书馆怎能再错过这样一个重新翻盘的机会。在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改国文为国语政策出台之前,商务印书馆已有筹备,抢在1919年就先行出版了由庄适编纂、黎锦熙等人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共8册),此乃中国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继而又出版《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4册),抢占了中国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的名头,同时还出版了《国音字典》《国音学生字汇》自习参考书。而到教科书语体变革政策出台的1920年,商务印书馆又由高梦旦等编印一套《新法教科书》推向市场。根据郑鹤声的记载,商务印书馆在以上三种国语教科书之外,“尚有简明、新体、实用、新著、民国、单级、复式种种教科书,相辅而行。”^[39]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也争相推出国语教科书。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仅1920年就审定了173册国语教科书,1921年又审定了118册。在出版商的眼中,从国文到国语的语体变革出台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出版市场诞生,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蜂拥而上,他们汲汲于国语教材的出版,都意在巨大的教科书出版市场分一杯羹。而正是出版市场的竞争,配合了知识精英的倡议和政府政策的施行,有力地推动了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的语体变革。正如有人指出的,“以国语运动为发财事业的书店方面的努力,其功也不可埋没。”^[40]而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1921年张元济重金邀请胡适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任职务时,胡适虽然最终拒绝并举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出任,但他分明在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语体变革中看到了出版社的力量,心有所动:“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41]

三、从学校到社会：官民互济下国语教科书的应用、普及与反拨

从倡议讨论到编撰出版，语文教科书的语体变革呈现出知识精英、政府官员、出版商等多元力量的协同互动。但这只是考察了国语教科书出版传播的上半场，亟待探讨的下半场是，这些国语教科书如何流入市场，如何进入全国中小课堂，在教学实践中，他们如何接受师生阅读的检验，这种国语教学又如何接受社会的检验？从“国文”到“国语”教科书的变革，改变的不仅是语文课堂的教学语体、教学内容，更是社会民众对白话国语的读写体验与观念认知，由此也必然在国语应用普及中遭遇社会的反拨。

（一）学校推行：国语教育的普及推广

1920年以后，教育部下令小学“国文”改“国语”之后，“国语”高歌猛进，而“国文”日渐式微。无论在学科教学还是教材推广方面，“国语”都开始力压“国文”，成为炙手可热的金字招牌。可以说，在国语推广过程中，教科书成为“传布国语的大本营”，成为“白话教育的总机关”。各省教育厅、各县劝学所、教育会以及各师范学校开始推广国语教育：“教科书和各种程度的读物都将使用国语，国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都用国语。”^[42]以国语教科书推行教育的要旨在“练习运用国语，养成其正确的听力及发表力；练习写字，以养成正确、敏捷的书写能力”，^[43]“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德智。”其先后步骤为“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次授以简单语词语句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篇章之构成，并采用表演、问答、谈话、辩论诸法，使练习语言”。^[44]相对既有的国文教科书，国语教科书容易学习掌握，编者收到的反馈意见也印证了此点：“据教的人说比用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45]在以国语为教科书的课堂教学中，诸多少少年儿童很快学会注音字母、查阅字典。一位曾经教授国文的老教师看到孙辈的进步，惊讶不已

又赞叹不已：“当今怪事难度量，孙儿倒比爷爷强。谭老先生倡新事，‘波泼墨佛’胜寒窗。”^[46]

相对国文教科书，国语教科书易教易学。但政策初改，国语初创，一切都在试探摸索之中，教授方法亟待调整，教学师资亟待培养。客观而言，从国文到国语的教育改革政策出台和推行稍显匆迫，以至于能够承担国语教学的教师非常匮乏。于是在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督促和民间知识分子主动组织的协同作用下，各地国语教育团体纷纷成立，为训练人才和推行国语做准备。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始举办国语讲习所，不但吸引诸多民间知识分子参与国语培训与国语推广，同时也有效利用出版社的力量。此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密切配合政府的语体改革政策，积极举办国语讲习所和承办国语学校，有效利用自己出版的国语类教科书培养大量国语教学人才。中华书局承办的“国语专修学校”和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国语师范学校”在几年内已经培养了1000多名国语教员。^[47]这些师资学员各回本省本乡后，以所学知识教育学龄儿童和乡民父老，很快成为当地学校推行国语教育、推广国语教科书重要的师资力量。在湖南，“第一届由北京回来的国语讲习生都很热心传播，什么‘研究会’，什么‘讲习所’，无论城乡，遍地皆是，官厅也很负提倡责任”。“小学教师们来学的，异常踊跃，就是那些已落齿不关风底老先生，他也拼命的去学习”“初改国语，不学注音字母，便就不能去当教员，有这种生活问题含在中间，所以不由他不热心学习”。^[48]在江西，该省教育会发起组织国语传习所初次招生，学额限定在60名，实际报名者居然有120余人，当地人不但学习国语的热情高涨，传播国语的热情也不遑多让：“我们已经毕业的同学们，多半往各处提倡国语去了，我们屡次接到他们关于传播国语的来信，都说有很好的成绩。”^[49]

（二）社会反拨：国语推广中的多元角力

学校与社会是交相影响的存在。自表面观之，从“国文”到“国语”的语文教科变革是教育

改革和教学实践领域的专业问题,但实际上国语教科书的出版传播又与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变革之间有着互动适应的过程。知识精英配合政府大力推行国语教育,是想要借助学校这一知识教育高地来引领社会风气、推进国语统一进程。但现实中,中小学课堂的国语推广高歌猛进,而社会民众的国语观念却迟滞不前,由此也会阻碍学校国语教育的开展。毕竟国语学习的使命并非单纯为了学校的升学考试,而是为了“求知识、谋职业和服务社会”。^[50]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现场不难发现,社会上依然存在着“语”“文”分离的问题,公牍、书札、报刊往往弃用白话、使用文言。由此引发社会对于以国语教科书开展教学的质疑:“语体文在社会上就没通行。你们看,上自宪法法律政治公文,下至合同契约日用便条,那一件不是用文言去写?现在凡用语体文写的东西,多半是浮浅的创作或小说,这些都是不合于应用的哟!不是我们要反对语体文,实是语体文自己没站在不叫人反对的地位上。”^[51]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国语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南方等其他地域对国语的观感和推行的力度必然大打折扣。正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域在学习注音字母,推行国语教育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境。有人甚至质问倡导国语教育的专家:“你们在京言京,固然如是,我们素来不出门,乡里来往,儿童学了国音国语,有什么用处?反不如学了国文,还可以靠此谋生。”^[52]“今使一出校门,而入于耳者,仍尽是娓娓之乡谈,则每周数小时之教课,果能奏若干效果也?”^[53]“国民学校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的读本,纯是国音练习,乡人看了这种书,认定是外国书(乡人说是洋书)。他们对于外国有一种天然憎恶心,所以他们看了外国书似的书,极端的不赞成”,况且“国语的语调和语音,大都根据北京话,语调不同,还没有多大的关系,语音不同,是个极大的难题,……这是乡人脑筋中最反对的”。^[54]由此不难窥见,社会观念与

学校教育的脱节已经成为国语推广的重大障碍。胡适就此反思道:国语教育“是彻上彻下、贯通整个社会的。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绝不肯去学”。^[55]针对学校与社会的互动问题,梁启超曾指出:“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学校与社会万不可以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56]

在从国文到国语的语体变革中,语言并非单纯的形式,而是蕴含着种种观念意涵的“有意味的形式”。教科书依托于一定的语言形式对少年儿童进行知识教育,此中也蕴含着认知的作战与观念的博弈,背后深藏着派系的对抗与权力的斗争。正如阿普尔所言:“在确定‘用谁的文化去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教科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57]正因如此,南方地方政府面对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以北统南”的做法心有微词,出现一种“奇怪现象”:“虽然南方在政治方面比较进步,但在语言方面却比较保守,当然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讲国语,而且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方言,他们认为推广国语是借以平衡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手段。”^[58]而北洋政府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徐世昌、段祺瑞到曹锟、张作霖,不同的政府首脑有不同的思想主张,从湖北省长陈嘉谟、奉天省长王永江到直隶省长褚玉璞,不同的地方官员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此中各种曲折复杂的政治关系导致国语教育推行不可能一帆风顺,历时维度根据主政官员的个人偏好呈现官民互济因时而异的时好时坏,横向维度不同地域官员的派系导致官民互济的因地而异的此好彼坏。在白话盛行一段时

间之后,文言的使用逐渐出现了回潮现象,报纸社论或案牘文告文言色彩相当明显和普遍。“湖北兼省长陈嘉谟,尚欲‘保文武未坠之道’,‘以崇正黜邪为宗’,特下令恢复‘存古书院’;旅鄂无锡公民杨钟钰、曹启文,特呈请孙联帅禁止男女同学,小学特重读经与国文,禁用白话(批令苏省教育厅核议)。”^[59]1925年,出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利用《甲寅》周刊批判白话/国语推广活动:“文者孕育理道”,以传于后,而“自白话文兴,立言无范”以致文化濒临破产,“中国人且失其所以为中国人而不自知”。^[60]教育部门的主政官员是文言的信徒,在国语推广方面自然不再用心着力,开始明里暗里推行文言教学。于是,官民互济的局面急转直下,知识精英与政府官员形成相互抵力掣肘的两股力量。此时的胡适虽然还在重复着“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的话语,但不免也深陷国语教育的窘境。于是钱玄同重新集合民间知识精英进行“二次革命”:“因此我们要集合全国的同志们,在各本地,大声疾呼的、协力同心的制造顶大的‘国语风’,尽量地把那弥漫不散的‘文言雾’吹散。”^[61]而胡适还在试图靠私人关系再造官民互济的格局,他致信在政府任职的罗家伦:“你现在政府里,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现的希望,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62]

四、结 语

在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变革中,胡适、蔡元培积极联合支持白话书写和国语教学的知识精英,同时积极借力政府政策、出版资本等多元因素,将白话引进教育教学体系,逐渐确立了白话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作为知识精英、政府官员与出版商“共谋”的产物,国语教科书是官民互济下共同打造国家标准语的过程,以白话为形式的国语教科书旨在生产具有“合法性”的语言和“权威性”的知识,并且在全国范围的中小

学课堂进行教学推广,进而为国语统一和国民启蒙奠定基础。当然,国语教科书的出版传播,并非总是多元力量的合舟共济,在现实教学推广中也遭遇了政治权力的干扰和社会民众的质疑,而这也反映了从国文到国语的语体变革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注释:

[1]蔡元培:《国文之将来——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年,第156页。

[2]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褚金勇:《启蒙的抑或政治的?——解读“五四”白话文传播的历史密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黎锦熙:《国语学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页。

[4]蒋维乔、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页。

[5][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0页。

[6][1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1-32页。

[7][8]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9]《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68-169页。

[10]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 语言文字独立》,《政艺通报》第2年第24号,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

[12]褚金勇:《雅俗之辨:晚清媒介转型与文人书写体式选择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23年第1期。

[13]李步青编:《新制各科教授法》(师范学校适用),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第24页。

[14][18][56]梁启超:《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李杏保等主编:《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上),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年,第46、46、43-44页。

[15]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16]钱玄同:《随感录·四十四》,《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17]黄介石:《修辞学的题目》,《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19]胡适:《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

[20][55]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87、674页。

[21]吴研因:《国语运动和白话文教科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46-447页。

[22]黄炎培:《小学校用白话文的研究》,《新教育》第2卷第1期,1919年9月。

[23]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62页。

[24]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25][57][美]M·阿普尔、L·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2页。

[26]盛兆熊、胡适:《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27]蔡元培:《国语研究会立案呈》,《申报》1917年3月27日。

[28]周作人、胡适等:《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39-441页。

[29]褚金勇:《启蒙的抑或政治的?——解读“五四”白话文传播的历史密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0][34][44][59]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1、175、161、192页。

[31]《咨各省区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1920年1月12日),《(民国)教育部文牍政令汇编第五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2119页。

[32]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33]《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7页。

[35]胡适之:《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1页。

[36]张元济:《东方图书馆况·缘》,《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页。

[37]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1924年9月1日),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337页。

[38]《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华教育界》第1卷第1号,1912年2月。

[39]高崧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25页。

[40][47]乐嗣炳:《十年来的国语运动》,《世界杂志》第2卷第2期,1931年8月10日。

[4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42][58]李治:《中国语言区域和语言的发展》,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25页。

[43]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45]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46]咎玉林:《一位爱国老教师逸事》,《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9辑,乌鲁木齐:新疆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125-126页。

[48]盛先茂:《湖南国语的状况》,《国语月刊》第1卷第4期,1922年5月20日。

[49]《国语界消息》,《国语月刊》第1卷第2期,1922年3月20日。

[50]《小学各科教学法号(上)》,《教育杂志》第16卷第1号,1924年1月。

[51]杜聿成:《致钱玄同信》,《国语周刊》第24期,1925年11月22日。

[52]乐嗣炳:《江苏教育会所征集国语进行困难问题的意见》,《国语月刊》第1卷第10期,1922年11月20日。

[53]罗重民:《国民之统一与国语之统一》,《学艺》第2号,1917年9月。

[54]朱有成:《乡村地方推行国文的难处和救济的方法》,《国语月刊》第1卷第8期,1922年9月20日。

[60]孤桐:《文俚平议》,《甲寅周刊》第1卷第13号,1925年9月5日。

[61]陆衣言:《全国国语运动大会缘起》,《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1期,1925年。

[62]胡适:《致罗家伦》,《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4-475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